

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

何啓民

宋祁在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儒學柳沖傳中，指出開元初年（七一三年——），沖等奉詔刊定姓氏錄，後來，柳芳根據它寫為專論，當中提到「過江則為僑姓……東南則為吳姓……山東則為郡姓……關中亦號郡姓……代北則為虜姓……」，像「僑姓」、「吳姓」等名稱，雖不一定是柳沖等所造作，也當是唐朝人的說法。因為在唐朝以前，還沒有能找到有關這種說法的記載。然而從這以後，很顯然地，已經不再把它當作是柳芳等一家之言，而視之為本來如是的事實，像五代王溥在他所編撰的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條裏，雖節引了這一段，却沒有標明它的出處，是一個最好的證明。而這些名稱，遂為後人所共認，一直沿用到今天，沒有絲毫加以改變，也沒有人來懷疑。當然，這並不是一件很偶然的事，可能是因為這些名稱，確乎能表現其各自的特質與精神來。

而現時我們所要討論的，則是「東南」的「吳姓」和「僑姓」和「吳姓」既然是東晉以下南方社會構成的兩大主流，與當時發生的各種問題，都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。然而一般人所注意的，只是在西晉永嘉（三〇七—三二二年）之亂以後，「過江」南下的中原士族，就是被稱為「僑姓」的。至於「東南」原有的舊家大族，就是被稱為「吳姓」的，却很少被人談論到，或牽涉到。在如此情形下，要想真正了解這一個時代，解釋這一個時代，顯然是有問題的。而本文的目的，也就是想以有限的篇幅，來尋求中古時代，吳姓在面臨如此巨大的一個衝擊和變化下，所表現的種切。

一、南北的差異

今天因為科學的極度發展，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，天然障礙的日漸消除，空間相對地縮小。可是在古代，天然障礙所帶給人類的困擾，却在人們心中投下一個難以克服的陰影。舟車的發明，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，橫亙在他們前面的，依然是困難和危險重重。多少年來，我們祖先所開創的文明，主要在於中原一帶。可是「江東」呢？雖有吳、越的建國，然而它們的興起也

快，衰亡也快，談不到對這一塊土地的開發和文明的開展有多少的貢獻和助力，自然而然的，在文明程度較高的中原人看來，這些地方不過是蠻夷之邦。尚書禹貢九州之一的揚州，「厥田惟下下，厥賦下上錯」，這不是卑視，而是當時的實情如此。這是一塊地形、氣候與出產，同中原全然不同的土地。多河川湖泊丘陵，而少大平原；多雨潮濕而溫暖，而不是乾燥陰寒；多魚蝦，而少牛羊。在中原人看來，這真是一塊奇怪的、貧瘠的、也是難於適應的土地。

在秦漢大一統的局面下，江東一帶接受中原文化的過程是緩慢的，却始終沒有中竭過。時間一天天地過去，漢文化確乎已經在這一塊土地上生了根。

我們可以從一些特定的、而足以代表漢人學術的項目，來說明這一點，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，論漢魏易學的傳授說：

漢初，傳易者有田何，何授丁寬，寬授田王孫，王孫授沛人施讎、東海孟喜、琅邪梁丘賀，由是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學。又有東郡京房，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，別爲京氏學，嘗立，後罷。後漢，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凡四家並立，而傳者甚衆。漢初，又有東萊費直傳易，號爲古文易，以授琅邪王璜，璜授沛人高相，相以授子康，及蘭陵母將永，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，而未得立。後漢陳元，鄭衆，皆傳費氏之易，馬融又爲其傳，以授鄭玄，玄作易注，荀爽又作易傳。魏代王肅、王弼，並爲之注，自是費氏大興，高氏遂衰。

除易學以外，漢人對於天體的討論是很流行的，自淮南子的天文訓開始，以至劉向、揚雄、桓譚、張衡、馬融、王充、鄭玄等，皆曾著論論之。後漢書卷二十劉昭補並注天文志引蔡邕表志曰：

言天體者有三家：一曰周髀，二曰宣夜，三曰渾天。宣夜之學，絕無師法。周髀數術具存，考驗天狀，多所違失，故史官不用。唯渾天者近得其情，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，則其法也。

同書卷八十九張衡傳注引名臣奏亦引邕之說。從這裏，也可以看出，除平子以外，各家天體說，大半紙上談兵，憑空想像，與其說是科學的，不如說他們是哲理的，想當然的。

而江東一帶，正承襲了這一傳統。

孫吳時，江東有好幾種易注出現。其一，是陸績的注京氏易傳，三國志卷五十七陸績傳曰：

績……博學多識，星曆算數，無不該覽。……作渾天圖，注易，釋玄，皆傳於世。

張惠言易義別錄云：

公紀（績字）注京氏易傳，則其易京氏學也。……今觀公紀所述，凡納甲、六親、九族、四氣、刑德生剋，無一言及之。至言六爻發揮，旁通卦爻之變，有與孟氏易相出入者。京氏自言其學即孟氏易，公紀儻得之耶？

是張氏以其雖法京氏易傳，而京氏易所特有的，諸如納甲、六親、九族、四氣、刑德生剋等，却未見涉及，反與孟氏易相出入。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顏延之廷誥曰：

易首體備，能事之淵，馬、陸得其象數而失其理。

既馬、陸並稱，其學可知。而公紀所講為漢易家法，當然毫無問題了。其二是虞翻的易注，虞翻和陸績同時，出於家傳孟氏易的世家，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注引翻別傳，載翻上易注奏曰：

臣高祖父，故零陵太守光，少治孟氏易；曾祖父，故平輿令成續，述其義，至臣祖父鳳，為之最密；臣先考，故日南太守欽，受本於鳳，最有舊書，世傳其業，至臣五世。前人通講，多玩章句，雖有秘說，於經疏濶。臣生遇亂世，長於軍旅，習經於枹鼓之間，講論於戎馬之上，蒙先師之說，依經立注。

翻的篤守家法，由是可以考見。較之陸績注京氏，而出入於孟氏，可以說是其學更為醇正。其三為姚信易注，其書十卷，見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引錄。信為陸績外甥，張惠言易義別錄輯姚氏易注序云：

其言乾坤致用，卦變旁通。九六上下，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，元直（信字）豈仲翔（翻字）之徒歟？抑孟氏之傳在吳，元直亦得有舊聞否？

從以上三注觀之，並上承漢代孟氏易，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。

至於天體論，三國志卷五十七陸績傳，稱績「作渾天圖」，開元占經卷一、卷二，都載陸績的渾天儀說；又卷六七，載陸

續的渾天圖。晉書卷十一天文志，載葛洪駁王充論，中有引渾天儀注語。以上大概即陸績的渾天圖，他主張衡之渾天，而駁王充之蓋天。晉書卷十一天文志又稱說：

至吳時，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，傳劉洪乾，象歷依其法（依陸績法），而制渾儀，立論考度。

云云。宋書卷二十三天文志同。劉氏主張「天體員如彈丸也」，「而陸績造渾象，其形如鳥卵」，認為不對。且陸績自己說天形正圓，與此所說形如鳥卵，也不免矛盾。劉氏之說雖然是在糾正陸績，但主張渾天，則是一致的。王蕃，三國志卷六十五有傳，云蕃「博覽多聞，兼通術藝」，後為孫權所殺。陸凱上疏稱蕃「知天知物」，乃是孫吳有名的天文曆算學者。他雖是廬江人，但渡江已久，仍可視為吳人。晉志又云：「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。」結論是「天行，寒依於渾，冬依於蓋」。他認為天體南低北高，所以稱「昕天」。又太平御覽卷二引晉陽秋曰：

吳有葛衡，字思曾，改作渾天，使地居中，以機轉之，天轉而地立。

入晉以後，江東人論天體者仍有數家，這與入晉以後，江東人在經學研究中，仍恪守漢儒家法，可以當作一件事來看。

江東學風，在經過長時間的學習以後，一遵漢傳統，而沒有稍加改易的時候，中原本身的學風，却有了一革命性的變化。這自然不是能在短暫的時間中所發生的突變，而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醞釀，再加上強大的外力所造成的結果。

這就是玄學興而談風起。

先是，東漢末年，董卓之亂，不過十年之間，為漢文化中心的兩京，並皆殘破一空。推動漢家學術思想主流——經學——的兩京，既遭到如此極度的摧殘，而不是僅僅暫時性的中斷，此一變化，使天下所共仰的京師，對於地方，不再有控制、拘束、和影響力了。

而使得學術思想不得不變的第二個原因，是曹操的用人政策。他在建安八年（二〇三年）、十五年（二一〇年）、十九年（二一四年）、二十二年（二一七年）四次求才令中，明白地表示他對當時重名輕能風氣的極度厭惡，輕易地破壞了數百年來人們的精神道德依托，却並沒有能拿出另外一套來代替它。在那動亂的時代，使得人們一方面是徬徨，沒有信仰，也無所依賴

。另外一方面，却也解脫掉數百年來思想上的鎖鍊和羈絆，人們開始可以盡量地去想，沒有人會來干涉。前此在獨尊儒術政策的陰影下，諸子之學不過是一道暗流，而今得以重見天日。學術思想自由的空氣，不僅帶給人們可以自由思想的權利，也帶給了人們自由思想、盡情思想、和創新思想的信心。

當漢魏之際，京師既因曹操重才不重德，激起了一連串關於名實才性的討論。而在魏都之外，却因經過長時期的變亂，經學雖仍受崇尚，已失去它的向心力，和足夠維繫人心的力量。三國志卷十荀彧傳注引何劭荀彧別傳曰：

祭字奉倩，祭諸兄並以儒術論議，而祭獨好言道。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，然則六籍雖存，固聖人之糠粃。祭兄俱難曰：「易亦云：『聖人立象以盡意，繫辭焉以盡言。』」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？」祭答曰：「蓋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舉也。今稱『立象以盡意』，此非通于意外者也；『繫辭焉以盡言』，此非言乎繫表者也。斯則象外之意，繫表之言，固蘊而不出矣。」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。

荀彧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傳統學術的反動者，在他看來，「六籍」不過是聖人之學的糠粃，易雖然說「立象可以盡意，繫象可以盡言」，然而對於象外之意，繫表之言，顯然是無能爲力，「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舉也」，就因爲它蘊而不出，所以才需要探討，而聖人的精意，即在於這些地方，聖人不是說過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麼？撇掉性與天道，專就六籍來談，永遠落於下乘，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祭之獨好言「道」，此「道」不必是老莊道家之「道」，如解釋它爲「性與天道」之「道」，也許更近於事實些。而「性與天道」，即人生和宇宙的問題，也就是討論天人之際的大學問。雖然對於荀彧的理論，我們知道得很少，其退出儒家經典的圈子，不僅對於篤守儒術的荀彧來說，是離經叛道；這在當時來說，可能也是聞所未聞。當他於太和初年（二二七年——）到達京師，所帶給京師學術思想界的新刺激，自也不在小了。使得京師的人，知道學問不在於儒術、經學之中，不在於現實世界所能得到印證的名實問題之中，而在性與天道之中，更在象、意之外。

何晏同王弼，在這期間，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。這時，新的談論方式，也漸漸爲人們所普遍接受。這即是美音制的談論，與乎論難的合流。何晏的吏部尚書的地位，使談論成爲一時的風氣。而何晏對論語，王弼對易、老子的新解釋，更使正始（二

四〇—二四九年）成爲談論最盛，也是談論技術，內容到達最巔峯的時代。他們樹立了言辭簡至不煩的標準，同時採取了用道入儒的玄論。可是在保守的經師看來，何晏王弼雖然講經，然而用道入儒的這一套，完全是背棄傳統，離經叛道，三國志卷二十八鍾會傳注引孫盛批評王弼的易注說：

易之爲書，窮神知化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。世之注解，殆皆妄也。況弼以附會之辨，而欲籠統玄旨者乎？故其叙浮義，則麗辭溢目；造陰陽，則妙願無間。至於六爻變化，羣象所效，日時歲月，五氣時推，弼皆擯落，多所不關，雖有可觀者焉，恐將泥夫大道。

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有多大的差異。

這一時期的中原，不僅在學風方面有了革命性的變化；在社會風氣方面，也同樣地與前截然不同，此即風俗的敗壞，世說任誕篇所引魏時諸條可以考見，故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引玄上疏曰：

近者，魏武好法術，而天下貴刑名；魏文慕道達，而天下賤守節。其後，綱維不攝，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。

干寶晉紀總論亦曰：

朝寡純德之士，鄉乏不二之老，風俗淫僻，恥尙失所。學者以莊，老爲宗，而黜六經；談者以虛蕩爲辯，而賤名檢；行身者以放濁爲通，而狹節信；進仕者以苟得爲貴，而鄙居正；當官者以望空爲高，而笑勤恪。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，標上議以虛談之名。劉頌屢言治道，傅咸每糾邪正，皆謂之俗吏；其倚杖虛曠，依阿無心者，皆名重海內。

諸如此者，在吳人看來，中原實已走入邪途，中原人被稱爲「北人」，更被稱爲「儉人」。可是，在中原人看來，這些「南人」，非但是出之於蠻夷之邦的「祭奴」，而且不論是從那方面來說，都是顯得太蔽寒落伍了，簡直可以說是早已跟不上時代了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南北的差異，不僅是由於土地、氣候、出產——甚至於方言、習慣風俗的不同；而且在魏晉以後，由於中原學術思想的驟變，而造成心靈上的隔閡。這真可以說是——一個時代的悲劇。

一一、南北的交惡

上一章，我們曾經談到過江東一帶是比較保守的，當中原學風轉變的時候，江東仍然一依漢儒家法，沒有絲毫改變。而東京自光武帝表章氣節以後，風俗特美，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七兩漢風俗條特別指出這點。吳人既然保守成性，這種重視氣節的傳統自給予吳人以深遠的影響。所以在孫氏父子占有江東之初，江東人明白地表示傾向於中原。建安十三年（二〇八年），曹操既得荊州，三國志卷五十四魯肅傳曰：

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，與諸將議，皆勸權迎之，而肅獨不言。權起更衣，肅追於宇下。權知其意，執肅手曰：「卿欲何言？」肅對曰：「向察衆人之議，專欲誤將軍，不足與圖大事。今肅可迎操耳；如將軍，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肅迎操，操當以肅還付鄉黨，品其名位，猶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不失州郡也；將軍迎操，欲安所歸？願早定大計，莫用衆人之議也。」權歎息曰：「此諸人持議，甚失孤望。今卿廓開大計，正與孤同，此天以卿賜我也。」

整個事情，似乎是由於曹操兵威，使得江東諸臣威懼失色，勸孫權迎降。可是我們看同卷周瑜傳曰：

其年九月，曹公入荊州，劉琮舉衆降，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，將士聞之，皆恐懼。權延見羣下，問以計策，議者咸曰：「曹公，豺虎也，然託名漢相，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爲辭，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。且將軍大勢，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，今操得荊州，奄有其地，劉表治水軍，蒙衝鬪艦，乃以千數，操悉浮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陸俱下，此爲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。而勢力衆寡，又不可論。愚謂大計，不如迎之。」瑜曰：「不然！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漢賊也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尙當橫行天下，爲漢家除殘去穢。況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？請爲將軍籌之……。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矣，徒忌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尙存，孤與老賊勢不兩立。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

注引江表傳曰：

權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及會罷之夜，瑜請見曰：「諸人徒見操書，言水步八十萬，而各恐懾，不復料其虛實，便開此議，甚無謂也。今以實校之，彼所將中國人，不過十五、六萬，且軍已久疲；所得表衆，亦極七、八萬耳，尙懷狐疑。夫以疲病之卒，御狐疑之衆，衆數雖多，甚未足畏，得精兵五萬，自足制之，願將軍勿慮！」權撫背曰：「公謹（周瑜）言至此，甚合孤心，子布（張昭）、文表（秦松）諸人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，獨卿與子敬（魯肅）與孤同耳。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……」

可見關鍵不是在兩方的力量懸殊；主要的，是在曹操「託名漢相，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爲辭」。身爲漢臣，雖然明知有如周瑜所說「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漢賊也」，然而就當時起事羣雄來說，誰沒有代劉氏而有天下的私心？而在劉氏一系尚在帝位，又有誰敢公開表示出此一心意？在這種情況下，可說是沒有什麼人比「挾天子以征四方」，「動以朝廷爲辭」的曹操更能號召人心，「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」是一個事實。所以周瑜得以爲「漢家除殘去穢」爲藉口，孫權也聲稱曹操「欲廢漢自立」，爲漢室存亡，與之勢不兩立。舉朝能爲孫權個人榮辱打算的，只有魯肅和周瑜兩人；其他的人，則以張昭、秦松爲首，主張迎曹操。秦松生平事跡但兩見於史書，三國志卷四十六孫策傳，謂策以「彭城張昭、廣陵張紘、秦松、陳端等爲謀主」，卷五十三張紘傳，亦云「初，紘與同郡秦松字文表、陳端字子正，並與紘見待於孫策，參與謀議，各早卒」，是秦松之忠於孫氏甚明。再看張昭，卷五十二昭傳評曰：

張昭受遺輔佐，功勳克舉。忠謇方直，動不爲己。而以嚴見憚，以高見外。既不處宰相，又不登師保，從容闔巷，養老而已。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。

昭不僅爲孫策謀主，見受託孤之重任，本傳「策臨亡，以弟權託昭，昭率羣僚，立而輔之」注引吳歷曰：

策謂昭曰：「若仲謀不任事者，君便自取之。正復不克捷，緩步西歸，亦無所慮。」

策之所以如此，正以昭之「忠謇方直，動不爲己」。以如此一個人，却責以「但顧妻子，挾持私慮」，真不知道是如何說起。

裴注復引江表傳曰：

昭忠讜亮直，有大臣節。權敬重之，然所以不相昭者，蓋以昔駁周瑜、魯肅等議爲非也。

臣於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，所存豈不遠乎。夫其楊休正色，委質孫氏，誠以厄運初遭，塗炭方始，自策及權，才略足輔，是以書誠匡弼，以成其業。上藩漢室，下保民物。鼎峙之計，本非其志也。曹公仗順而起，功以義立。冀以清一諸華，拓平荆郢。大定之機，在於此會。若使昭議獲從，則六合爲一，豈有兵連禍結，遂爲戰國之弊哉！雖無功於孫氏，有大當於天下矣。昔贊融歸漢，與國升降；張魯降魏，賞延于世。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，寵靈之厚，其可測量哉！然則昭爲人謀，豈不忠且正乎！

張昭忠於孫氏，更忠於漢室。而他這種「忠讜方直，動不爲己」的作風，自不合於孫權之心意，更不能長此肅漢而小吳的風氣。孫權不是不知道張昭之可相，不是不知道張昭之比任何人都要合於拜相之資格條件，就因爲這樣，尤其看到舉朝臣子全隨着他主張迎曹操，更不能不用張昭爲相了。關於這一點，注引江表傳說得非常清楚，曰：

權既卽尊位，請會百官，歸功周瑜。昭舉笏欲褒贊功德，未及言，權曰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！」昭大慚，伏地流汗。

如江表傳這條屬實的話，張昭也沒有錯，因爲以前漢室尙存，旣爲漢臣民，自當忠於漢室，爲漢天下打算，而今漢旣爲曹氏所篡，孫氏立國江東，則已爲吳臣，處境不同，不能以此責備張昭。而孫權這種做法，也是有根據的，卽仿效東漢光武帝，以鞏固孫氏在江東的政權。他要使吳人皆忠於孫氏，忠於新皇朝。所以光武所努力的表章氣節那一套，在中原雖被曹操所破壞了；在江東，孫權却更加加以發揚。對於吳人來說，對此並不陌生，多少年的浸潤，是如此的普遍而深入於人心！

孫權之稱帝建國，在曹丕篡漢而漢亡以後。張昭態度雖有轉變，原則並沒有改變，裴松之許他「忠讜方直」，江表傳亦以他「忠讜亮直」，其原因亦就在此。在吳人保守的心目中，曹氏旣代漢，其爲漢賊已無庸議，孫權初雖稱臣於曹魏，終則樹敵於中原，與蜀漢成鼎足三立之勢，對孫氏可說是只有感激之意。自劉漢的臣民，一變而爲孫吳的臣民，是順理成章，再自然不

過的。再加上孫權又是有心人，非但壓抑忠於漢室更勝於孫家的張昭以示儆於後來，又善於待士，養士，三國志卷五十四周瑜傳，稱建安十三年，曹操率大軍將南下，會於赤壁，黃蓋獻詐降之計，注引江表傳載蓋書曰：「蓋受孫氏厚恩，常爲將帥，見遇不薄……。」雖然只是向曹操表白自身處境，却虛中有實，叫曹操不疑，而這一點也正是導致黃蓋之所以肯犧牲的原因所在，同書卷五十五凌統傳注引孫盛曰：

觀孫權之養士也，傾心竭思，以求其死力。泣周泰之夷，殉陳武之妾，請呂蒙之命，育凌統之孤，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。是故雖令德無聞，仁澤內著，而能屈彊荆吳，僭擬年歲者，抑有由也。

陳壽亦評曰：

凡此諸將，皆江表之虎臣，孫氏之所厚待也。

而孫氏又善於用婚姻的方式，繫縛人心。凡此，皆可見孫氏之用心處。而孫吳的終於敗亡，雖說是主驕政弊，咎由自取，然而要吳人接受這一個事實——從孫吳的臣民，一變而爲晉室司馬氏的臣民，受中原人的統治，非但是痛苦的，也是難堪的。何況自漢末動亂，羣雄並起，大一統的局面，開始分裂。中原與江東，漸次地形成了兩個世界，各自發展。尤其在孫氏據有江東，進而立國其地，數十年的時間，更加擴大了其間的差異，這在上章，已有詳細的說明。在江東一帶的人看來，都些「北人」，偶而也稱之爲「僮人」的，居然拋棄傳統的經學、儒術、美好的風俗，而走上了玄學清談，甚且敗壞了道德名教的這條邪路。而在中原人的眼中，「南人」的評價，較之過去，似乎也大爲貶低，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曰：

翻與少府孔融書，並示以所著易注，融答書曰：「聞延陵（季札）之理樂，觀吾子之治易，乃知東南之美者，非徒會稽之竹箭也。又觀象雲物，察應寒溫，原其禍福，與神合契，可謂探頤窮通者也。」

以孔融自視之高，輕易不許人的，竟讚揚虞翻備至。對「東南」的觀感可說是一新。可是隔了才不過半個世紀，却有了三百六十度的轉變。這時的中原人，眼裏的「南人」，不論從那方面來說，都是顯得太蔽塞落伍，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了。何況，他們還是戰敗的被征服者，這更顯示出他們南方的不如我們中原。晉書卷五十八周處傳：

及吳平，王渾登建邺，釀酒既酣，謂吳人曰：「諸君亡國之餘，得無感乎？」處對曰：「漢末分崩，三國鼎立，魏滅於前，吳亡於後，亡國之感，豈惟一人！」渾有慙色。

王渾鄙夷吳人，躍於言表。同樣，亦見於下引之卷五十二華譚傳，王濟之問譚，父子間同有些事，自非偶然。而當少數吳人，接受了亡國的這一個事實，被逼入洛，對於他們來說，是被逼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，他們去到了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陽。當我們翻檢這一段的歷史時，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出來中原人在言行舉動上，莫不處處表明他們的優越感，這使得吳人感到無比的屈辱和難堪，真是難以忍受，華譚傳曰：

華譚，字令思，廣陵人。祖融，吳左將軍，錄尚書事。父譚，吳黃門郎。渾荄歲而孤……及長，好學不倦，爽慧有口辯。……太康中，刺史嵇紹，舉譚秀才，……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。同郡劉頌，時爲廷尉，見之歎息曰：「不悟鄉里，乃有如此才也！」博士王濟，於衆中嘲之曰（御覽四百六十引文士傳，作「會宣武場，坐有辯者嘲南人」。）：「五府初開，羣公辟命，採英奇於仄陋，拔賢儒於巖穴。君吳楚之人，亡國之餘，有何秀異，而應斯舉？」譚答曰：「秀異固產於方外，不出於中域也。是以明珠、文具，生於江鬱之濱；夜光之璞，出乎荆藍之下，故以人求之。文王生於東夷；大禹坐於西姜，子弗聞乎？昔武王克商，遷殷頑民於洛邑，諸君非其苗裔乎？」濟曰：「夫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至於君臣失位，國亡無主，凡在冠帶，將何所取哉！」答曰：「吁！存亡有運，興衰有期。天之所廢，人不能支。徐偃修仁義而失國，仲尼逐魯而逼齊，段干偃息而成名，諒否泰有時，曷人力之所能哉！」

斟注引世說蔡洪赴洛事，以爲「與此略同」，然稱其穿鑿，並以御覽四百六十四亦作華譚證之。按此或當時吳人流行之對答辭句，以塞洛中人士之口，是以或作華譚，或作蔡洪，固不必定於某一人。世說言語篇除引此事外，又曰：

陸機詣王武子，武子前置數斛羊酪，指以示陸曰：「卿江東何以敵此？」陸云：「有千里萹羹，末下鹽豉耳！」
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同。言語篇又曰：

滿奮畏風，在晉武帝坐。北憲作琉璃屏風，實密似疎，奮有難色。帝笑之，奮答曰：「臣猶吳牛，見月而喘！」

注曰：

今之水牛，唯生江、淮間，故謂之吳牛也。南土多暑，而此牛畏熱，見月疑是日，所以見月則喘。

蔡洪、陸機事，固然可以看作洛中人士鄙夷江南的好例證。而滿奮以「吳牛」自喻，「見月則喘」，同樣地可以視之爲洛中人士以吳地保守、落後、愚昧、無知，「見月疑是日」，貽笑於大方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當孫吳覆亡後，去到洛中的，雖然很有些南土的舊家大旅子弟，像前引蔡洪、陸機等極負時譽的，固然亦受到少數一些人的讚譽尊敬，有如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所云：

至太康末，與弟雲俱入洛，造太常張華，華素重其名，如舊相識，曰：「伐吳之役，利獲二俊。」

然而能像張華那樣有着開濶胸襟的，畢竟太少了，大半是像王濟（武子）之流，對於南土，絲毫不加禮遇，世說方正篇曰：

盧志於衆坐，問陸士衡：「陸遜、陸機，是君何物？」答曰：「如卿於盧毓、盧玘。」士龍失色，既出戶，謂兄曰：「何至於此！彼容不相知也。」士衡正色曰：「我父祖名播海內，寧有不知，鬼子敢爾！」

御覽卷三百八十八郭子、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並引其事。又簡傲篇：

陸士衡初入洛，咨張公所宜詣，劉道真是其一。陸既往，劉尙在哀制中，性嗜酒，禮畢，初無它言，唯問：「東吳有長柄壺盧，卿得種來不？」陸兄弟殊失望，乃悔往。

這是洛中人士故意羞辱，還是洛中風氣輕蕩不重，我們很難分別。可能兩種成份都有，而前者的比例更大。

而當入洛吳人，像陸機者，靠了本身才力一攀登了高位之後，所引起的反應却是強烈的，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云：

太安初（三〇二—三〇三年），（成都王）穎與河間王顥，起兵討長沙王乂，假機後將軍、河北大都督，督北中郎將王粹、冠軍將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。機以三世爲將，道家所忘，又羈旅入宦，頓爲羣士之右，而王粹、牽秀等皆有怨心。固辭都督，顥不許。

而御覽四百二十三國春秋亦曰：

機吳人，而在寵族之上，人多惡之。

話都說得非常明白。以一個他們所最看不起的被征服者的吳人，來做他們的統帥，所引起的怨恨心理，是可以想像到的。而成都王雖用了陸機，然而對於他忠貞的信心，却並不強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衆將不聽號令，而成都王在衆小包圍下，對他既不支持，又不諒解，反輕信讒詐之言，以他爲有異志，「遂遇害於軍中，時年四十三。二子：蔚、夏，亦同被害。既死非其罪，士卒痛之，莫不流涕」。其弟陸雲、陸耽，亦同時被害，同卷雲傳曰：

大將軍參軍孫惠，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：「不意三陸相攜闖朝，一旦煙滅，道業淪喪，痛酷之深，荼毒難言，國喪僑望，悲豈一人！」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。

三國志卷五十八陸機傳注曰：

機天才綺練，文藻之美，獨冠於時。雲亦善屬文，清新不及機，而口辯持論過之。于時，朝廷多故，機、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……以機行後將軍，督王粹、牽秀等諸軍二十萬……機吳人，羈旅單宦，頓居羣士之右，多不厭服。機屬戰失利，死散過半。初，宦人孟玖，穎所嬖幸，乘寵豫權，雲數言其短，穎不能納，玖又從而毀之。是役也，玖弟超亦領衆配機，不奉軍令，機繩之以法，超宣言曰：「陸機將反。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，以爲持兩端，玖又搆之於內，穎信之，遣收機，並收雲及弟耽，並伏法。機兄弟既江南之秀，亦著名諸夏，並以無罪夷滅，天下痛惜之。……初，機之克步闡也，誅及嬰孩，識道者尤之曰：「後世必受其殃！」及機之誅，三族無遺。孫惠與朱誕書曰：「馬援擇君，凡人所聞。不意三陸相攜暴朝，殺身傷名，可爲悼歎。」

陸氏既三吳著姓，父祖名播海內，人所共仰，而一旦無罪盡誅，洛中人士固爲之大快，吳人又將如何？孫惠與朱誕書，甚且以「晉」爲「闖朝」「暴朝」，否則，如以稱成都王穎，不會加一「朝」字。而書中所云，「痛酷之深」，「悲豈一人」。而且像三陸同樣際遇的，還多的是，周處就是一個例子。本來，吳人對於中原就無多大好感，晉書卷四十六劉頌傳，稱頌在淮南上疏曰：

夫吳越剽輕，庸蜀險絕，此故變覺之所出，易生風塵之地。且自吳平以來，東南六州將士，更守江表，此時之至患也。又內兵外守，吳人有不自信之心，宜得壯主以鎮撫之，使內外各守其舊。又孫氏爲國，文武衆職，數擬天朝，一旦堙替，同于編戶，不識所蒙更生之恩，而災困逼身，自謂失地，用懷不靖。……

既言「吳人有不自信之心」，復言「自謂失地，用懷不靖」，晉書卷五十二華譚傳，亦提到武帝策問何以「吳人輕銳難安易動」，今則更加此事，怨讎更深。然而晉室既有天下，人衆兵強，吳人雖有所不滿，亦無可奈何。及八王亂起，羯胡禍生，琅邪王睿得王導之教，出鎮江東，問題遂出現，併書卷六十五王導傳曰：

時元帝爲琅邪王，與導素相親善，導知天下已亂，遂傾心推奉。……帝之在洛陽也，導每勸令之國，會帝出鎮下邳，請導爲安東司馬，軍謀密策，知無不爲。及徙鎮建康，吳人不附，月餘，士庶莫有至者。

吳人與琅邪王本無恩怨之可言，他們之所以在琅邪王至建康後月餘而士庶未有至者，純然是出諸琅邪王是北人之故，「吳人不附」一句，道盡吳人痛恨北人之心。而世說言語篇曰：

元帝始過江，謂顧驃騎（榮）曰：「寄人國土，心常懷慚。」

「吳土」今已爲「晉」有三十餘年，而元帝居然說出「寄人國土」的話來，從這也可以見到南北隔閡之深，同書又曰：

過江諸人，每至暇日，輒相要出新亭，藉卉飲宴。周侯（顛）中坐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河之異。」皆相視流淚。南人固然不附，不以北人爲同胞，同樣，北人亦不以吳土爲己土，雖被逼而遷此，終有寄人籬下之感。「江河之異」，即此一念，北人已明白表示不願立國江東，然而事實上又被逼而處此，故問題遂轉而成爲「吳人」是否願接受他們。這才是晉室之能否立國江東，另起爐竈，苟延殘喘的關鍵所在。

三、吳人地位的轉變

在晉室渡江以前，在晉人亡吳以後，這一段時間裏，歷史告訴我們，只有少數吳人入洛，數月雖然不多，却是三吳最著名

望的舊家大族子弟，最具名望的豪傑之士，是「二俊」也好，「三傑」也好，是「二陸三張」也好，然而入洛之後，待遇之冷淡，譏刺鄙視多而禮遇少。經過一段時間，雖有顯達如陸氏兄弟者，而動輒得咎，災禍隨之；顧榮能保身全身者，唯「終日昏酣」，晉書卷六十六顧榮傳曰：

吳平，與陸機兄弟同入洛，時人號爲三俊。例拜爲郎中，歷尙書郎，太子舍人，廷尉正，恆縱酒酣暢，謂友人張翰曰：「惟酒可以忘憂，但無如作病何耳！」……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，冏擅權驕恣，榮懼及禍，終日昏酣，不綜府事，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。熊謂冏長史葛旗曰：「以顧榮爲主簿，所以甄拔才望，委以事機，不復計南北親疎，欲平海內之心也。今府大事殷，非酒客之政。」旗曰：「榮，江南之望士，且居職日淺，不宜輕代易之。」熊曰：「可轉爲中書侍郎，不失清顯，而府更收實才。」旗然之，白冏，以爲中書侍郎。在職不復飲酒，人或問之曰：「何前醉而後醒邪？」榮懼罪，乃復更飲，與州里楊彥明書曰：「吾爲齊王主簿，恆慮禍及，見刀與繩，每欲自殺，但人不知耳！」……榮數踐危亡之際，恆以恭遜自勉。

在亂世，顧榮即使不是南人，也可能同樣不免於禍，然而由於榮是南人，身處中原羣士之中，動輒得咎，可能性當更增加。而他們之有這種地位，與其說是中原執政者「不復計南北親疎，欲平海內之心也」，不如說他們在某些方面，遠超過他們的中原同僚。他們的能力，他們的忠誠可靠，在在說明了這點。而這些南方俊彥，當中原亂起，他們之能脫身逃歸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榮傳又曰：

至徐州，聞亂日甚，將不行。會刺史裴盾，得東海王越書，若榮等顧望，以軍禮發遣。乃與榮及陸玩等，各解船棄車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得還揚州。

書鈔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曰：

顧榮、紀瞻被徵，見王路塞絕，遇之下邳，解舫爲單舸，而歸之。

御覽七百七十引王隱晉書亦謂榮等：

一日一夜行五、六百里，遂得免。

在如此情況下逃歸，要說他們對晉室毫無怨恨之心，也是不能想像的。

而今，琅邪王帶着他的部屬來到了南方，而這時的南人，正在痛恨北人的顛峯時代，不僅是陸機兄弟子姪的被害，也由於三吳的舊家大族子弟這些年來的際遇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南人具有的兩漢經學舊傳統舊風氣，與而今北人的新學風，新的談論風氣，甚至於新的處世態度，新的道德標準，是如此的不同，而今也正正面地發生了接觸和衝突。琅邪王睿要在如此一個惡劣環境和氣氛下，被南人接受，該是何等的艱難。而如此一個難題，琅邪王却能在王導的指導和輔助下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，這真可說是一個奇蹟，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曰：

……後參東海王越軍事，時元帝爲琅邪王，與導素相親善。導知天下已亂，遂傾心推奉，潛有興復之志，帝亦雅相器重，契同友執。帝之在洛陽也，導每勸令之國，會帝出鎮下邳，請導爲安東司馬，軍謀密策，知無不爲。（對注引御覽二百四十八晉中興書曰：「軍國之事，無不諮訪。」）及徙鎮建康，吳人不附，居月餘，士庶莫有至者，導患之。會敦來朝，導謂之曰：「琅邪王仁德雖厚，而名論猶輕。兄威風已振，宜有以匡濟者。」會三月上巳，帝親觀禊，乘肩輿，具威儀，敦、導及諸名勝，皆騎從。吳人紀瞻、顧榮，皆江南之望，竊覘之，見其如此，咸驚懼，乃相率拜於道左。（對注引類聚四晉中興書曰：「王導謂從兄敦曰：『王仁德未著，而名位猶輕。兄威名日已振，宜有以共相匡舉。』」三月三日，中宗出禊，乘肩輿，敦、導並騎從。紀瞻使人覘之，既聞敦、導騎從，乃大驚，自出拜於道左。」）導因進計曰：「古之王者，莫不賓禮故老，存問風俗，虛己傾心，以招俊乂，況天下喪亂，九州分裂，大業草創，急於得人者乎！願榮、賀循，此土之望，未若引之，以結人心。二子既至，則無不來矣。」帝乃使導躬造循，榮，二人皆應命而至。由是，吳會風靡，百姓歸心焉。自此之後，漸相崇奉，君臣之禮始定。俄而洛京傾覆，中州士女避難江左者十六七，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，與之圖事。時荆揚晏安，戶口殷實，導爲政，務在清靜。（對注引御覽二百四十八晉中興書曰：「導忠於事上，達於從政，以百六之弊，寄寓江左，爲治之本，務在清靜。」）每勸帝剋己勵節，匡主寧邦，於是尤見委杖，情

好日隆，朝野傾心，號爲仲父。帝嘗從容謂導曰：「卿，吾之蕭何也。」對曰：「……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。願深弘神慮，廣擇良能。顧榮、賀循、紀瞻、周玘，皆南土之秀，願盡優禮，則天下安矣。」帝納焉。

我們引錄這一段，爲的是要說明當時琅邪王的處境，與王導何以要如此做。在中原人來說，這完全是不得已的，既因「百六之弊，寄寓江左」，如不能「寄寓江左」，則一切都是空的。而要「寄寓江左」，則首先要優禮這些「南土之秀」，否則天下何以能「安」？尤其江東的吳人，他們的心情，在長時期中，強烈的自卑感，却已被一種更爲強烈的屈辱所掩蓋。他們對中原統治者既無可奈何地接受他們的統治，然而却絲毫不加掩飾地表示了他們對中原人的不滿。中原人在他們擁有天下時，對這可以視若無睹，可是而今琅邪王要用江東作爲新的據點時，却不能不加考慮了。王導的策略，是用三吳的舊家大姓子弟，來誘使吳人接受他們，這遠比用武力來壓制，以取得一時之功，更爲有效，何況這時的琅邪王，也實在沒有這強大得足以壓制吳人的力量，遂而不得不採用這和平的手段。從這裏，也可以看出導傳所說的紀瞻、顧榮、覬敦、導騎從護衛琅邪王，驚懼出拜道左的不一定是事實。雖然這可以說明此輩猶熱衷於此，作爲下文的伏筆，却不需要王導採用羈縻安撫吳人的手段了，雖然這也可以解釋說，王導先威之以威，再加之以恩，恩威並濟，則事無不成。晉書卷六元帝紀曰：

永嘉初（三〇七年——），用王導計，始領建鄴，以顧榮爲軍司馬，賀循爲參佐、王敦、王導、周顛、刁協，竝爲腹心股肱，賓禮名賢，存問風俗，江左歸心焉。

導傳稱導進「計」，元紀亦稱用王導「計」，用此「計」，始能領鄴，江左始歸心。元帝採取的所有對吳人的政策，都是出之於王導之「計」，類聚十三引晉中興書曰：

禮接名賢，設官分職，隱恤士庶，百姓歸心焉。
其中尤其重要中，是用吳以制吳，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：

元帝鎮江東，以榮爲軍司，加散騎常侍，凡所謀畫，皆以諮焉。榮南州望士，躬處右職，朝野其推敬之。（斟注：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曰：「當時後進，盡相推謝，稱榮有大才令望。」書鈔六十三晉中興書、吳郡顧錄曰：「於是朝野皆

服，中興基此焉。」……時南士之士（書鈔六十三引晉中興書、吳郡顧錄作「南士諸士」），未盡才用，榮又言：「陸士光真正清貴，金玉其質；甘季思忠款盡誠，膽幹殊快；殷慶元質略有明規，文武可施用；榮族兄公讓，明亮守節，困不易操；會稽楊彥明、謝行言，皆服膺儒教，足爲公望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；陶恭兄弟，才幹雖少，實事極佳。凡此諸人，皆南金也。」書奏，皆納之。

或說「賓禮名賢」，或說「禮接名賢」，或說「盡優禮」，「收其賢人君子」，「皆納之」，既爲我用，再「凡所謀畫，皆以諮焉」，不成問題的，江東爲我所有了。又同卷紀瞻傳：

元帝爲安東將軍，引爲軍諮祭酒，轉鎮東長史，帝親幸瞻宅，與之同乘而歸。（附注：御覽七百七十四晉中興書曰：「紀瞻爲鎮東王左長史，丹陽、宣城、新安三郡中正，王常幸其家，同乘還府，瞻甚見禮遇，鄉郡榮之。」案鎮東王卽元帝，其時以琅邪王爲鎮東將軍也。三暉中正，本傳失載。）

又同卷賀循傳：

建武初，爲中書令，加散騎帝侍。……朝廷疑滯，皆諮之於循，循輒依經禮而對，爲當世儒宗。……俄以循行太子太傅，太常如故，循自以枕疾廢頓……累表固讓，帝……不許，命皇太子親往拜焉。循有羸疾，而恭於接對，詔斷賓客，其崇遇如此。疾漸篤，表乞骸骨，上還印綬，改授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帝親臨軒，遣使持節加印綬。循雖口不能言，指麾左右，推去章服。車駕親幸，執手流涕，太子親臨者三焉，往還皆拜，儒者以爲榮。太興二年卒，時年六十，帝素服舉哀，哭之甚慟。……將葬，帝又出臨其柩，哭之盡哀，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，皇太子追送近塗，望船流涕。

我們從這些記載，可以看出琅邪王確乎已接受了王導所教的一套羈縻吳人的辦法，給予他們很高的位置，給予他們禮遇，使得這些吳人中的領導份子，有一種知遇之感，認爲他們是遇到了明主，不僅一變原先「徙鎮建康，吳人不附，居月餘，士庶莫有至者」的狼狽情況，反使顧榮輩爲他們謀畫，更反過來安慰他們，世說言語篇曰：

元帝始過江，謂顧驃騎曰：「寄人國土，心常懷慙。」榮跪對曰：「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，是以耿、亳無定處，九鼎遷洛邑，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。」

楊勇校箋曰：

元帝之鎮建鄴，于時天下雖亂，而朝廷猶存。而榮卒於永嘉六年（三一二年），後此七年（大興元年，三一八年），元帝方爲天子，於云遷都，殆見安東時也。陳寅恪曰：「國土，指孫吳之國土。人，卽顧榮代表江東士族之諸人。」

世說文字、內容固與史實不盡相同，多有可議處。然而這種吳人對中原人觀念上的改變，中原人與吳人關係的改善，是可以相信的。而紀瞻且爲元帝勸進之主要人物，此亦爲王導之計謀乎？或眞發自內心？是一件最值得我們研究的事。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：

尋遷丞相軍諮祭酒。論討陳敏功，封臨湘縣侯。西臺除侍中，不就。及長安不守，與王導俱入勸進，帝不許。瞻曰：「陛下性與天道，猶復役機神於史籍，觀古人之成敗。今世事舉目可知，不爲難見。二帝失御，宗廟虛廢，神器去晉，于今二載，梓宮未殯，人神失御。陛下膺籙受圖，特天所授。使六合革面，遐荒來庭。宗廟旣達，神主復安。億兆向風，殊俗畢至。若列宿之縮北極，百川之歸巨海。猶欲守匹夫之謙，非所以闡七廟，隆中興也。但國賊宜誅，爲以此屈已謝天下耳。而欲逆天時，違人事，失地利，三者一去，雖復傾匡於將來，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！適時之宜萬端，其可綱維大業者，惟理與當。晉祚屯否，理盡於今。促之則得，可以隆中興之祚；縱之則失，所以資姦寇之權，此所謂理也。陛下身當厄運，纂承帝緒，願望宗室，誰復與讓？當承大位，此所謂當也。四祖廓開宇宙，大業如此。今五都燔燹，宗廟無主，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，陛下欲高讓於東南，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。臣等區區，尚所不許，況大人與天地合德，日月並明，而可以失機後時哉！」帝猶不許，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坐（書鈔一百三十二引晉中興書，作「帝使殿中將軍韓續，徹去便殿所御牀帳」）。瞻叱績曰：「帝坐上應星宿，致有動者，斬！」帝爲之動容。及帝踐位，拜侍中，轉尚書。

這真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。

可是，我們要知道，這種觀念的改變，關係的改善，不是一蹴可至的，是有一段艱苦曲折的過程的。這關係晉室的延續，琅邪王的稱帝，中原人能在五胡亂華，中原板蕩的局面下，尚能在江東找到一立足點。當然，所有這些，並不是可以廉價取得的，他們得去掉他們保持已久的優越感，並得付出相當的代價，來換取所有的這些。

照一般來說，南北地理環境不同，人物互異，世說言語篇曰：

王武子（濟，太原晉陽人）、孫子荆（楚，太原中都人），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。王云：「其地坦而平，其水淡而清，其人廉且貞。」孫云：「其山崔嵬以嵯峨，其水泔渫而揚波，其人磊砢而莫多。」（注曰：「案：三秦記、語林，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，與此語同。」）

先天的不同，加上後天的差異，再加上征服者的強烈優越感，與被征服者被壓抑鄙視，而不得不屈服，無可奈何的心境，使南北的鴻溝日益加深，南北的隔閡日益增加。却陰錯陽差地，驅使北人南來，尋求生存空間，北人既已喪失其所憑藉，但求南人之能接納他們，以尋求立國之地，復國之機。而北人所能付出的代價，即政權——包含某些重要職位，和數量上幅度的增加——的開放。不是說在西晉吳亡後，南人沒有仕宦者，而是說那些南人所擔任的職位和數量，到晉室南渡後，都有了相當的改善。

從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及東晉將相大臣年表、晉及東晉方鎮年表、秦錫圭補晉執政表及補晉方鎮年表，吳廷燮晉及東晉方鎮年表等參酌來看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在西晉與東晉兩個時期，吳姓在仕官中，形成一個如何強烈的對照來。雖然東晉的朝廷重要職位中，包括所謂將相大臣及方鎮，南方的舊家大族所佔的比例，遠不如中原人。甚至於在東晉的末年，有很多年幾乎可說是空白的；而在另外很多年，也不過聊聊一二人。然而就東晉的初期、中期來看，比之於西晉吳亡以後的那一段時間，情況的改善，是很顯然的。

一般來說，東晉時期，政治職位對吳人是開放的，至少，對三吳的舊家大族是開放的。政治待遇與政治地位的得到普遍改善，是如此的顯著，吳人的身份，不再是像西晉時多以諸侯王幕僚的姿態出現，而擔當的是朝廷的清官和重臣。這豈是中原人

心甘情願如此做的，只是情勢所逼不得不如此罷了。

四、東晉僑姓與吳姓的關係

從以上看來，「吳姓」政治上的待遇和地位的改善，確乎是一個事實。而這種政治待遇同地位的改變，對於「吳姓」同「僑姓」之間的關係，產生了如何的影響，是我們接着要討論的。

從「僑姓」對「吳姓」來說，這種「改變」是不得已的，只是爲了要達到能在南方立足，以尋求復國之機，不得不採納王導的「計」，而付出的代價。爲了這樣，才不得不「賓禮名賢」，「禮接名豪」、「盡優禮」，以「收其賢人君子」，儘可能地表現出與對「僑姓」一視同仁的態度，世說雅量篇曰：

許侍中（瑛，注引晉百官名曰：「許瑛，字思文，義興陽羨人。」）、顧司空（和）俱作丞相從事。爾時已被遇，游宴集聚，略無不同。嘗夜至丞相許戲，二人歡極。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。顧至曉迴轉，不得快熟；許上牀，便自哈臺大鼾。丞相戲謂諸客曰：「此中亦是難從眠處！」

「游宴集聚，略無不同」，「二人歡極」，然而這畢竟是一種表面上的，兩姓間潛意識中始終有一種隔閡，而不能全然坦誠地相處，顧和之所以「至曉迴轉，不從快熟」，未嘗不可以此點來解釋。又雅量篇云：

謝安南（奉，注引晉百官名曰：「謝奉，字弘道，會稽山陰人。」）免吏部尚書還東，謝太傅（安）赴桓公司馬（溫）出西，相遇於破岡。既當遠別，遂停三日共語。太傅欲慰其失官，安南輒引以他端，雖信宿中塗，竟不言及此事。太傅深恨在心未盡，謂同舟曰：「謝奉故是奇士！」

實際上，謝奉不是「奇士」，而是「吳姓」，致使「僑姓」的謝安有心竟無法相通之恨。這種中間「隔」了一層，在「吳姓」與「吳姓」相處時，是沒有的，排調篇云：

魏長齊（顓，注引魏氏譜曰：「顓，字長齊，會稽人。」）雅有體量，而才學非所經。初宦當出，虞存嘲之曰：「與

卿約法三章：談者死，文筆者刑，商略抵罪。」魏哈然而笑，無忤於色。

這種「隔」與「不隔」，是很微妙的一件事，「吳姓」在心理上，始終不能把「僑姓」看作同「吳姓」一樣，反之亦然。這或者是由於「僑姓」的優越感，和「吳姓」的自卑感；也或者是由於不同的環境和文化的背景所造成的吧！晉書卷八十九王獻之傳：

嘗經吳郡，聞顧辟疆有名園，先不相識，乘平肩輿，徑入。時辟疆方集賓友，而獻之游歷既畢，傍若無人。辟疆勃然，數之曰：「傲主人，非禮也；以貴驕士，非道也。失是二者，不足齒之倫耳！」便驅出門，獻之傲如也，不以屑意。事亦見世說簡傲篇。而言語篇曰：

顧司空（和）未知名，詣王丞相（導）。丞相小極，對之疲睡。顧思所以叩會之，因謂同坐曰：「昔得聞元公（顧榮）道公協贊中宗，保全江表。體小不安，令人喘息。」

而文學篇亦云：

中朝時，有懷道之流，有詣王夷甫諮疑者。值王昨已語多，小極，不復相酬答。乃謂客曰：「身今少惡，裴逸民亦近在，君可往問。」

雖云「疲睡」，究有輕視之意，否則通宵酬答，亦有其例。而王獻之之傲，顧君孝之諂，成一極端之對照。又方正篇：

張玄與王建武（忱）先不相識，後遇於范豫章（寧）許，范令二人共語。張因正坐斂衽，王熟視良久，不對。張大失望，便去。范苦譬留之，遂不肯住。范是王之舅，乃讓王曰：「張玄，吳士之秀，亦見遇於時。而使至於此，深不可解。」王笑曰：「張祖希若欲相識，自應見詣。」范馳報張，張便束帶造之。遂舉觴對語，賓主無愧色。

「吳姓」對「僑姓」，同「吳姓」對「吳姓」，有一個根本意識上的差異，這也是我們前面所講的，前者「隔」而後者「不隔」。他們雖嚮往「僑姓」，潛意識上的自卑感却又往往使從他們不是過份的諂媚，就是過份的矜持，前者如顧君孝，而後者則有陸士瑤。在東晉的初期，僑姓居首的琅邪王氏，在羈縻懷柔的政策下，曾請婚陸氏，以結好吳姓，居然被拒絕。而且

不是加以婉拒，是明白地表示出他們的立場和態度，世說方正篇曰：

王丞相（導）初在江左，欲結援吳人，請婚陸太尉（玩）。對曰：「培塿無松柏，薰蕕不同器。玩雖不才，義不爲亂倫之始。」

晉書卷七十七陸曄附弟玩傳亦著錄其事，惟改「初在江左，欲結援吳人」句，作「初至江左，思結人情」。以此來看，當亦是王導羈縻吳人之「計」，對王導來說，這已是很够委屈了，怎麼也想不到會遭到被拒的命運。陸玩忝爲王導同僚，屬下。陸玩的拒絕王導的請婚，不是自卑感太重，不敢高攀，而是潛意識裏就無「僑」「吳」通婚的一念，甚至於將之比擬爲「亂倫」，其嚴重可知，而「吳姓」的保守也由是可知。

然而經過長時間的交往，長時間的共處，其影響也是深遠的。原先南北之間的隔閡，征服者的優越感，而今已爲渡江投靠所帶來寄人國土的心情所沖淡；被征服者受人鄙視的屈辱，亦爲羈縻政策下特殊的禮遇所化解。最關重要的，即學術思想及文化觀念上的不同，亦在南人努力學習下，也許在如此一種環境中無形的薰染，南人不僅接受了中原的玄學和談論，甚且漸而能相抗衡，進而出人頭地了。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曰：

初，雲嘗行逗留故人家，夜暗迷路，莫知所從，忽望草中有火光，於是趣之，至一家便寄宿，見一年少，美風姿，共談老子，辭致深遠，向曉辭去，行十許里，至故人家，云：「數十里中無人居。」雲意始悟，却尋昨宿處，乃王弼冢。雲本無玄學，自此談老殊進。

對注：

水經穀水注袁氏王陸詩序曰：「機初入洛，次河南之偃師，忽結陰，望道左若民居者，因往逗留，見一少年，姿神端逸，與機言玄。機服其能，而無以酬折，前致一辯。機題緯古今，綜檢名實，此少年不甚欣解。將曉去，稅駕逆旅，嫗曰：『君何宿而來，自東數十里無村落，止有山陽王家墓。』機乃怪悵，還睇昨路，空野霾雲，攢木蔽日，知所遇者，乃王弼也。」（御覽六百十七、八百八十四兩引異苑，均作「陸機」，文與此略異。又引一條，則作陸雲事。）案此事

或屬諸「機」，或屬諸「雲」，豈二陸同入洛事耶，不能臆斷也。

事雖不必爲真，然而可以說明二陸入洛前，南北學風迥異：北方「言玄」；而南方與荀粲到京邑前，京邑講名實才性相同，爲「題緯古今，綜檢名實」，兩者是全然相異的。然而到了東晉，情況已有轉變，卽江東學風雖仍重漢傳統之經學與天體論，已受到王導等人南下後所帶來中原談玄風氣的影響，世說夙慧篇：

司空顧和，與時賢共清言。張玄之、顧敷，是中外孫，年並七歲，在牀邊戲。于時聞語，神情如不相屬。暝，於燈下，二小兒共叙客主之言，都無遺失。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：「不意衰宗，復生此寶！」

又言語篇曰：

張玄之、顧敷，是顧和中外孫，皆少而聰惠，和並知之，而常謂顧勝，親重偏至，張頗不厭。于時，張年九歲，顧年七歲。和與俱至寺中，見佛般泥洹像，弟子有泣者，有不泣者。和以問二孫，玄之謂：「彼親故泣，彼不親故不泣。」敷曰：「不然！當由忘情故不泣，不能忘情故泣。」

顧和自稱「衰宗」，當由於是「吳姓」而有着多少的自卑感之故。而今中外孫竟能仿效清言，從到極大的滿足，因如此一來，前途有望，是以用「寶」稱之，爲家門、祖宗爭光不少。有此長上，乃有此童稚，其受到鼓勵，是必然的。而童稚之能如此，寧不可畏。尤其顧敷以「情」之「忘」「不忘」立論，宛然王、何。又文學篇：

張憑（引注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「憑字長宗，吳郡人。」）舉孝廉出都，負其才氣，謂必參時彥，欲詣劉尹（愔，字真長），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。張遂詣劉，劉洗濯料事，處之下坐，唯通寒暑，神志不接。張欲自發，無端。頃之，長史（王胡之，字修齡）及諸賢來清言，客主有不通處，張乃遙於末坐判之，言約旨遠，足暢彼我之懷，一坐皆驚。眞長延之上坐，清言彌日，因留宿。至曉，張退，劉曰：「卿且去，正當取卿共詣撫軍（簡文帝）。」張還船，同侶問何處宿，張笑而不答。須臾，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，同侶惋愕，卽同載詣撫軍。至門，劉前進謂撫軍曰：「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！」旣前，撫軍與之話言，咨嗟稱善，曰：「張憑勃窣爲理窟！」卽用爲太常博士。

事亦見御覽六百十七引郭子。又二百二十九引郭子，及晉書卷七十五張憑傳。南北同風，至此完成，晉書卷七十七陸曄傳謂曄數番請辭，重復自陳曰：

臣實凡短，風操不立，階緣嘉會，便蕃榮顯，遂總括憲臺，豫聞政道，竟不能敷融玄風，清一朝序，咎責之來，於臣已重。

「不能敷融玄風」，其爲罪，猶同漢時之不能「調理陰陽」，其所代表的意義，是泯除南北文化上的隔閡；其內在的精神，是南北意識上的調和與統一。

後記：本論文原名「東晉吳姓考」，得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完成。初稿成於民六十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後改名「兩晉的吳姓」。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刪節修正，並改今名。